

##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大型平台企业凭借先进的算法技术快速拓宽其业务领域，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并实施了一系列垄断行为，例如，常见的自我优待、价格歧视和算法封锁等。这些行为触发了一系列反垄断规制问题，可能对市场的创新活力造成负面影响，压缩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侵害消费者权益和侵犯个人隐私。

但由于平台经济有着区别于传统实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使得传统的反垄断法难以识别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外开展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从全球经验来看，各国针对平台经济垄断地位所采取的监管举措，都深刻反映了结构主义在反垄断领域的核心理念。因此，以结构化的视角来全面审视整个反垄断体系，已成为当前反垄断领域的主流趋势。本文主张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研究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路径，并不是主张严格回归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而是，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尝试跳出原有的框架逻辑重视市场结构所带来的垄断风险。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以期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互联网竞争环境。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研究了平台经济时代下结构主义理论的复兴，通过对平台经济特征的分析，总结出平台经济垄断形成的原因。平台经济的特殊性使得传统的反垄断规制理论乏力，促使了结构主义的再复兴。

第二部分，总结归纳我国平台经济的垄断现状，并具体分析传统反垄断法在识别平台垄断行为方面的困境。主要包括行为主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失灵、事后监管框架失灵、经营者集中审查标准不完备以及平台垄断优势的事前规制不足。

第三部分，分析比较国外采用结构主义规制平台经济垄断的经验，为我国结构主义视角下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提供借鉴。

第四部分，针对上述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尝试从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探讨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重构平台经济反垄断分析框架、引入守门人制度重构监管框架、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完善平台垄断优势事前规制的建议。

**关键词：**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结构主义

#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V
绪论.....	1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
(一) 选题背景.....	1
(二) 选题意义.....	2
二、文献综述.....	3
(一) 国内研究综述.....	3
(二) 国外研究综述.....	7
三、研究方案设计.....	8
(一) 采用的研究方法.....	8
(二) 创新与不足之处.....	9
第一章 平台经济时代结构主义理论的再复兴.....	10
第一节 平台经济的定义及特征.....	10
一、平台的定义.....	10
二、平台经济的定义.....	10
三、平台经济的特征.....	11
第二节 平台经济垄断形成的原因.....	12
一、双边市场为平台垄断提供市场环境.....	12
二、数据形成市场进入的壁垒.....	13
三、锁定效应与转移成本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	14
第三节 平台经济垄断问题促使结构主义再复兴.....	15
一、结构主义的兴起.....	15
二、结构主义的衰落.....	16
三、结构主义的再复兴.....	16
第二章 我国平台经济垄断的规制现状及困境.....	19
第一节 我国平台经济垄断的规制现状.....	19
一、立法现状.....	19
二、执法现状.....	20

三、问题 .....	21
第二节 传统反垄断法在识别平台垄断行为方面的困境 .....	22
一、基于行为主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失灵 .....	22
二、事后监管框架失灵 .....	25
三、经营者集中审查标准不完备 .....	26
四、对平台数据垄断优势的事前规制不足 .....	28
第三章 域外采用结构主义规制平台垄断的经验 .....	30
第一节 欧盟的经验 .....	30
一、守门人的定义 .....	30
二、数字守门人的义务 .....	31
三、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 .....	32
第二节 美国的经验 .....	32
第三节 对域外经验的评价 .....	34
一、对平台进行结构性规制 .....	34
二、合理性原则向本身违法原则转变 .....	35
三、采用更加确定的认定标准 .....	35
第四章 结构主义视角下平台经济垄断的规制建议 .....	37
第一节 重构平台经济反垄断分析框架 .....	37
一、引入结构主义分析框架 .....	37
二、构建分析方法的阶梯适用制度 .....	38
第二节 引入守门人制度重构监管框架 .....	38
一、针对特殊主体适用 .....	39
二、客观量化的守门人认定标准 .....	39
第三节 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 .....	40
一、加大对大型企业并购的限制 .....	40
二、细化审查标准 .....	41
第四节 完善平台垄断优势事前规制 .....	41
一、完善数据采集规则 .....	42
二、完善数据互操作规则 .....	42
三、完善数据整合规则 .....	43
结语 .....	45
参考文献 .....	46
致谢 .....	50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然而，部分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其市场主导地位 and 先进算法技术，实施了一系列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于这些挑战的存在，我国传统的反垄断法已无法完全契合平台经济市场竞争的现行规则。如何对平台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以及采用何种反垄断规制模式对互联网平台进行规制，成为了国际反垄断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反垄断规制模式主要由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构成。其中，结构主义模式侧重于通过调整行业集中状态来控制市场集中度。在此模式下，法律不仅对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行为进行规范，还承担着调整市场结构的重任。在结构主义模式下，存在两种主要的规制策略。第一种是对已形成的垄断企业进行拆分，目的在于使市场恢复具有竞争性的结构；第二种则是限制企业通过集中手段获得垄断地位，并在分析市场竞争时特别关注市场份额的影响，以避免单个企业占据过高市场份额的情况出现。相对而言，行为主义模式则更为专注于规范那些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行为，而对企业的集中度并不作过多考虑。行为主义强调事后干预，结构主义强调事前干预。

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主要采取以事后监管为主导，辅以事前监管的方式。然而，由于平台经济自身的双边市场、零价格、网络外部性等，使得市场竞争行为更加隐蔽和复杂，出现了算法合谋、自我优待和数据垄断等新型垄断行为。这导致传统的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在应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竞争效果的分析往往难以得出确定性的结论。

同时，以事后监管为主的行为主义模式在应对这些新型垄断行为时，难以满足当前时代对鼓励科技创新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要求。分析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由过去以追求经济效率为主的自由放任态度，转变为现在的积极执法和加强事前监管的策略。如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案》设立了平台守门人制度，加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事前监管。同样，美国国会针对平台反垄断问题，起草了《终止平台垄断地位法

案》、《平台竞争与机会法案》等五大草案。这些草案涵盖了多种结构性的反垄断措施，如禁止自我优待、实施拆分以及强制互操作等。从全球的监管实践来看，对于平台经济所形成的垄断地位，各国都采取了结构主义的监管措施来应对平台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在域外实践经验中，结构主义的监管措施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在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中，以结构化的视角来审视反垄断体系，已成为当前反垄断领域的大势所趋。这样的做法有望带来更理想的反垄断法实施效果，更好地满足时代的要求。

同时，在 2020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明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重点任务。随后，2021 年 3 月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也进一步强调了“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以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性。对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视，本质上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反垄断监管理念。

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探讨在结构化视角下，如何对平台经济进行反垄断监管。通过深入分析欧美在监管理念上的差异及其立法现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以期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反垄断规制路径。

## （二）选题意义

### 1. 理论意义

第一，结构主义以量化标准界定适用对象，能够有效解决行为主义对平台经济进行事后监管中出现的困境，例如，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等方面存在一些困难。

第二，推动监管模式创新。数字化时代的平台垄断效应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垄断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导致平台头部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因此，针对平台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必须采取全新的方法和策略进行处理。事前监管模式的提出和应用，可以推动监管模式的创新。这有助于适应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特性，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 2. 现实意义

第一，结构主义采取事前监管、弥补了事后监管的不足，增强了数字市场的执法力度，提高了执法效率。采用事前监管的确定性标准，可以很好的解决行为主义在平台经济领域中面临的认定困难。

第二，降低监管成本。结构主义所推崇的本身违法原则，在现今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范中展现了显著的优势。它显著减少了执法机构所需的论证过程和繁复的调查取证环节，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执法负担，节约了执法的时间和成本。此外，采用事前监管的方法，有助于提前发现和处理，能够有效规范平台企业的垄

断行为。

第三,保护消费者权益:事前监管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防止其对市场造成实质性损害,从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确保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第四,结构主义的事前规制,通过明确规定平台的数据互操作义务,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竞争性,有利于事先从结构方面降低大型平台实施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可能性。防止其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施加不公平的条件,建立更加开放、公平、自由的数字市场环境。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的治理成为当前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sup>1</sup>。整理国内研究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平台经济因其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为反垄断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平台通常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在这两种效应往往会形成市场进入壁垒,从而阻碍市场中其他竞争者及时参与到竞争活动中<sup>2</sup>。平台作为双边市场将平台的两方主体连接起来,使其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是指通过提高生产水平等原因,扩张企业规模,使得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sup>3</sup>。为此,互联网平台往往采取低价吸引消费者进驻,以此获得不断增加且愈来愈牢固的用户基数,以保持有相似需求的周边市场和有不同需求的另一边市场上用户的强大吸引力。在两种效应的作用下,容易出现“赢者通吃”和“强者恒强”的现象<sup>4</sup>。此外,在平台经济中,网络交叉外部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网络交叉外部性的存在,平台企业通常会采用差异化的定价策略,对商家一侧收取较高的费用,而对消费者一侧则收取较低的费用,甚至免费提供服务。这种定价机制有助于平台企业吸引更多的用户,从而扩大其用户规模<sup>5</sup>。平台企业竞争的核心在于获取用户规模,尤其是达到盈利所需的最低用户规模。网络交叉外部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促进了平台企业市场势力的形成,平台依靠市场势力不断扩大其用户规模,进而增强网络交叉外部性并获取丰厚收益。这导致大型平台因其庞大的用户规模而占据优势。相比之下,规

<sup>1</sup> 石良平,王素云,王晶晶.从存量到流量的经济学分析:流量经济理论框架的构建[J].学术月刊,2019,51(01):50-58.

<sup>2</sup> 时建中,吴宗泽.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2(01):108-125.

<sup>3</sup> 李海帆,李燕.对经济新形态的认识:微观经济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59-177.

<sup>4</sup> 王明泽.结构主义视角下数字经济垄断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23(03):129-139.

<sup>5</sup> 王岭,廖文军.互联网平台“二选一”的反竞争效应研究——以京东诉天猫“二选一”案为例[J].管理科学,2021,34(02):80-93.

模较小的平台在竞争中常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更加难以被准确识别和判定。

基于平台经济独有的特征,传统反垄断工具难以适用。对于平台经济带来的反垄断法规制困境如何进行规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 1.以平台企业所在的相关市场为研究对象

确定相关市场以及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两个核心环节。其中,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特定时间针对某一类别商品或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和地域范围<sup>1</sup>。界定相关市场的理论依据在于各种商品或服务间的替代性。实际操作中,可采用假定垄断者测试和供给替代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界定。在进入平台经济时代后,由于平台经济独有的特征,使得传统反垄断分析工具在平台经济中失灵<sup>2</sup>。一方面,面对“零定价”形式普遍存在以及网络外部性特征会放大弹性替代分析边界<sup>3</sup>。同时,在市场边界区域模糊的互联网平台中,传统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偏差<sup>4</sup>。另一方面,在处理涉及多方业务范围的双边市场平台时,想要准确识别和分析其相关市场并非易事<sup>5</sup>。

面对平台经济中相关市场界定困境,陈兵、徐文主张在认定相关市场时应引入新因素,应结合案件中争议行为所涉及的行业特征、商业模式、应用场景、技术手段、时间市场等影响需求供给替代分析的具体因素展开个案研判<sup>6</sup>。在市场认定方面,考虑到大型互联网平台免费服务的广泛性,谭家超、李芳认为应该减少对价格因素的关注,而更加重视从供给或需求替代性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sup>7</sup>。王先林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可以模糊处理,但不能直接跳过此步骤<sup>8</sup>。

在处理双边市场平台,尤其是那些以多领域跨界竞争为突出特点的平台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在行为主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下,无法准确分析其相关市场。同时,学者提出了若干解决措施,如降低价格因素的影响力、着重对供给或需求替代性方面的分析以及对相关市场界定可以做模糊处理等方法。但学界对于如何界定相关市场仍未达成共识,首先,虽然提出了可以考虑新的因素,但在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并未说明,例如在双边互联网平台中,新考虑的因素是在双边

<sup>1</sup> 慕亚平,肖小月.我国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探析[J].学术研究,2010(04):69-76.

<sup>2</sup> 李凯,樊明太.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的新问题、新特征与路径选择[J].改革,2021(03):56-65.

<sup>3</sup> 胡丽.反垄断法视域下网络空间“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兼评“奇虎诉腾讯垄断案”中全球市场的认定[J].河北法学,2014,32(06):44-50.

<sup>4</sup> 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J].法学研究,2021,43(04):149-170.

<sup>5</sup> 王先林,曹汇.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三个关键问题[J].探索与争鸣,2021(09):54-65+178.

<sup>6</sup> 陈兵,徐文.规制平台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理与实践[J].学习与实践,2021(02):87-96.

<sup>7</sup> 谭家超,李芳.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国际经验与对策建议[J].改革,2021(03):66-78.

<sup>8</sup> 王先林.论反垄断法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J].江淮论坛,2021(02):5-13+2.

市场都考虑，还是只考虑其中一方市场，如果只考虑一边市场的话考虑哪一边市场，这样模糊处理可能会导致实践中认定时出现争议。其次，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进步，市场和商业模式在持续变革中不断推陈出新。但是即便是当前考虑的新要素，在日新月异的创新浪潮中也可能逐渐失去适用性。

## 2. 以是否构成市场支配地位和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对象

在判断市场支配地位时，一般是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三条中所列举的因素进行考量。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判断：一是市场份额超过二分之一，且没有证据表明其不具有市场支配力；二是市场份额虽未超过二分之一，但有其他证据表明其实际上具有控制市场的能力，例如掌握了某种必要设施；三是在市场份额难以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若分析结果显示该经营者具有显著的市场影响力。然而，在互联网平台的环境下，市场份额的计算变得复杂且困难。由于平台服务往往具有免费性质，传统的以“销售额”为基础的市场份额核算方法无法适用。张生、李捷主张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市场份额，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如用户数量、点击量、在线时长以及流量数值等<sup>1</sup>。但是，如何选择和确定这些指标以及采用何种标准来判定市场支配地位，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赖丽华认为市场份额依然判断市场支配地位最主要的依据，但需要对其进行适当改良，将用户数量和数字平台的营业收入两项指标纳入考虑范围<sup>2</sup>。

对于如何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王先林主张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需要对流量、数据以及算法等关键因素进行考察<sup>3</sup>。郭传凯认为可以采用专门性规制来解决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的问题。将年活跃用户数、平台核心业务以及平台内经营者数量等因素作为平台企业的认定标准<sup>4</sup>；李鑫认为由于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的复杂性、多样性。这加剧了执法机构适用行为救济的难度，可以采用结构性救济的总体思路对平台经济采取事前规制的方法<sup>5</sup>；张卫东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参照欧盟《数字市场法》的规定，在限制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把透明度作为平台应承担的一项义务。当平台达到相应规模或实力时，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sup>6</sup>。

在对如何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探讨中，学者一开始也是主张加入新的因素进行考虑，以解决传统反垄断分析方法失灵的困境。但也存在对新加入的因素如何具体适用没有说清，可能会出现认定的个案性。近年来，国内已有部分学者

<sup>1</sup> 张生,李捷.数据驱动型并购中数据垄断监管的欧盟模式及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2023(10):120-132.

<sup>2</sup> 赖丽华.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律规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05):67-75.

<sup>3</sup> 王先林.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和反垄断问题的法律思考[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04):34-45.

<sup>4</sup> 郭传凯.超级平台企业滥用市场力量行为的法律规制——一种专门性规制的路径[J].法商研究,2022.

<sup>5</sup> 李鑫.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结构性救济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01):110-120.

<sup>6</sup> 张卫东.欧盟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及其借鉴[J].电子政务,2022(03):77-87.

开始从结构性救济的角度出发,探讨平台经济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问题。但讨论的较少,并未形成完整、系统的论述。

### 3.以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监管措施为对象

在针对平台经济进行反垄断监管时,平台企业比传统工业企业具备更加明显的动态创新特点以及经营活动中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些特点使得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在应对时显得颇为吃力。现有的时候监管模式增加反垄断法的实施难度<sup>1</sup>。国内学者意识到了互联网平台因其独特的特征、强大的算法技术和数据等,实现了经济活动的扩展。这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带来了挑战。如何对平台经济进行有效的反垄断监管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杨东认为平台、数据、算法的三维经济结构与传统经济的竞争要素结构和原理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数字经济反垄断法的理论框架和法律体系也应该予以重构,同时可以借鉴DMA,引入事前监管机制,避免监管分散化,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sup>2</sup>。赵燕菁认为对于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行为可以采取国有化的管理措施。由于平台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具备类似政府的属性,因此采取国有化的管理措施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法<sup>3</sup>。王晓晔认为采用公共政策应对平台经济的问题的观点值得商榷。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平台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平台企业所获得的垄断地位也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应采用市场监管的方式监督<sup>4</sup>。唐要家、唐春晖认为在对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监管时,采取事后查处违法行为的规制体制,不能实现反垄断目标。应采用事前结构性预防措施与事后执法相结合的反垄断监管和新体制<sup>5</sup>。王先林、方翔认为反垄断的全球监管呈现出执法严厉性的趋势。但是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既要避免不监管,也要防止过度监管。可以引入合规监管等措施,加强对平台的事前监管<sup>6</sup>。王明泽主张在规制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垄断问题上,需要吸取结构主义的事前监管理念,从市场结构角度解决垄断问题<sup>7</sup>。胡晓红主张基于数字经济市场以数据为竞争核心,其垄断行为的隐蔽性以及相关市场界定的模糊性,事后监管不能有效的解决数字平台的反垄断问题,对此需要采取针对数据垄断行为的事前监管<sup>8</sup>。张卫东主张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可以借鉴欧盟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通过创新市场界定、强化反垄断执法以及建立与反垄断法相适应的事前监

<sup>1</sup> 陈兵.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J].法学,2020(02):103-128.

<sup>2</sup> 杨东.论反垄断法的重构: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J].中国法学,2020(03):206-222.

<sup>3</sup> 赵燕菁.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集团事件的本质[J].政治经济学报,2021,20(01):3-12.

<sup>4</sup> 王晓晔.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

<sup>5</sup> 唐要家,唐春晖.数字产业化的理论逻辑、国际经验与中国政策[J].经济学家,2023,(10):88-97.

<sup>6</sup> 王先林,方翔.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趋势、挑战与应对[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87-97.

<sup>7</sup> 王明泽.结构主义视角下数字经济垄断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23,(03):129-139.

<sup>8</sup> 胡晓红.反垄断法视域下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之构造[J].学海,2023(02):164-172.

管，实现平台的有序发展<sup>1</sup>。杨明对新布兰代斯学派的主张给予了肯定，他很赞同新布兰代斯学派认为芝加哥学派忽略了竞争结构的观点。他着重指出了在反垄断分析中，重视竞争结构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从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市场集中可能对动态效率和企业竞争力产生的潜在影响<sup>2</sup>。曹阳提出在构建平台经济反垄断机制时，应聚焦于行为对数据市场的潜在作用，并回溯至结构主义范式，强调市场结构变动对竞争环境的深远影响。他强调，仅仅依靠价格和产出作为评估平台是否存在反竞争行为的准则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寻求并确立一种新的范式<sup>3</sup>。

综上，面对传统反垄断监管所不能解决的平台经济垄断问题，学者们从一开始主张应该加强事前事中监管到认为重点是加强事前监管。不论是主张加强事前结构性预防，还是主张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互相结合，都体现出了在面对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上有向结构主义事前监管回归的趋势。尽管学者们对反垄断监管的讨论颇多，但缺乏对于结构性事前监管的系统性讨论。

## （二）国外研究综述

十九世纪时美国学者开始对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行为进行研究，Jean-Charles<sup>4</sup>和 David S<sup>5</sup>认为平台具有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市场属性。“价格结构”是双边市场区别于传统单边市场的关键特征。在平台经济中，企业不断发展创新算法技术，使所实施的垄断行为更具隐蔽性，平台两侧信息不对称加剧，这使得传统反垄法规制平台经济变得十分困难。Jonathan Baker 认为竞争结构以及由其产生的市场力量是反垄断法的关键问题。反垄断规制的目的是实质性、长期性、持续性的限制市场力量，以防止平台企业实施反竞争行为<sup>6</sup>。对于如何有效的规制平台反垄断行为。Marshall 认为要加强事前监管，从事前寻求促进竞争结构的方法，保证市场的自由竞争<sup>7</sup>。

同时，关于是否需要平台经济的市场结构进行反垄断监管，也产生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方面，Halaburda 认为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并不会造成持久的市场进入障碍，反而认为垄断局面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价格<sup>8</sup>。Richeter 认为独

<sup>1</sup> 张卫东. 欧盟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及其借鉴[J]. 电子政务, 2022(03): 77-87.

<sup>2</sup> 杨明.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二元分析框架[J]. 中外法学, 2022, 34 (02): 366-384.

<sup>3</sup> 曹阳. 数据视野下的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与规制[J]. 电子知识产权, 2018(10): 89-97.

<sup>4</sup>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sup>5</sup>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J]. Yale Journal of Regulation, 2003.

<sup>6</sup> Jonathan Baker, The Antitrust Paradigm: Restor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p>7</sup> Marshall Steinbaum and Maurice Stucke, “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andard: A New Standard for Antitrust”[J].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20.

<sup>8</sup> Halaburda, H, B. Jullien, and Y. Yehezke, Dynamic Competition with Network Externalities: Why History Matters, 2021.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47041146164006153>